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七十期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编者的话：马克思主义原是批判西方资本制度弊端的学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扩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曾使马克思主义先后在俄国、东欧、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由共产党执政国家的“输出革命”是它重要的传播方式，本文所述柬共建政即是一例。

从词义上讲，所谓革命，就是打破制度；反之，维护制度就要反对革命。因此，那些革命成功的党面临的两难处境是，对内如何既建立并巩固制度又坚持革命，对外如何既遵守国际规则和平共处又推动世界革命颠覆“资产阶级政权”。

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与制度的冲突不断激化，革命的逻辑——继续革命与世界革命——终于占了上风，在内部导致了文革，在外部使输出革命更加激进。

本文作者周德高先生的经历，正与这一过程相重合。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得以了解这一复杂过程。他所描述的中国驻柬使馆的功能，正体现了上述那种悖谬的“双轨制”：“既要处理国与国的事务，还要处理党与党的事务”。

如果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于“革命与制度”的冲突，赤柬的屠杀则起于建立“革命的制度”的企图。从赤柬的所作所为中，我们不难发现由马克思首创、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展的学说体系所有的“精华”，其最直接的摹本是产生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毛泽东思想：从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甚至“农村包围城市”，到建制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

私有制、指令经济等等样样俱全，乃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搞起了婚姻配给制，取消了城乡差别，并且“一举消灭了阶级”。这一“革命的制度”在短短的三年里消灭了上百万人口，使柬埔寨这一古老的佛国翻作人间地狱。

与中国的文革一样，赤柬的暴行震惊了世界。人们看到，宣称要从资本奴役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竟被引向反社会反人类的境地。它证明了，一种学说即使设想再美好，一旦被以反人性的手段强力推行并走向极端，会造成怎样的灾难。它遇到的抵抗是历史的抵抗，也是社会的抵抗。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终于“盛”极而衰——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确实是马列主义思想体系的“顶峰”。

毋庸讳言，人类制度历经千万年的演变，其间充斥着血腥与不义，但毕竟保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高度的文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更促进了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世界的繁荣。人类制度演变的自发性和复杂程度，远非人的理性所能把握，更非人的理性所能凭空构造。认为能够彻底根除“旧制度”，建立一套“新制度”的“理性的狂妄”，最终将以反理性的疯狂收场：“古拉格”、“文化大革命”、“S-21”，就是此类乌托邦在历史中的缩影。

本期摘编自《我与中共和柬共》（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2007年8月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未经作者授权。

我与中共和柬共

周德高笔述 朱学渊撰写

关于柬埔寨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几十年前人口只有六百万，还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柬埔寨王国分成二十个省，金边和磅逊（今“西哈努克港”）是两个直辖市。人口中高棉族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它又名高棉国，国中百姓百分之八十是农民，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徒，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林木葱郁，物质充裕，民风淳厚的国家。

柬埔寨的华侨，大部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华侨既善务农，更善于经商，生活水平高出柬族土著和越侨许多。华侨在商言商，善于处事，更没有因领土纠纷引起的感情纠纷，因此华侨的处境比越侨又要好得多。越侨主要住在沿河地带，从事捕鱼业，经济上的成功，远不如华侨。

柬埔寨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认同心理又非常宽松。有华裔血统的人，不会说中国话，不在清明祭祖，与柬族通婚，就被看成柬埔寨人了。我的外祖母是柬族人，母亲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我的父亲是从潮州来的，家中说潮州话，我们是认同中国的。柬共领袖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农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华人血统，但他们都不认同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

一八八九年，具有不同语言文字的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被法国整合成一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柬埔寨社会依然保持宽容和自由；各族人民互相认同，和睦相处。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也带来了在欧洲游荡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暴力的列宁主义迅速又渗入印度支那。而中国农民共产主义的胜利，更教唆柬埔寨人民搞起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从此这个美好的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十世纪初，越南出了一位青年阮爱国，他就是后来的革命家胡志明。早年他在法国游学，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回来，在广州参加中国的大革命，还曾经被捕入狱。一九三〇年二月三日，他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那时，党内虽然有寮国支部和柬埔寨支部，但主要成员都是越南人。一九三五年，印支共产党初具规模，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预设革命成功后，将根据人民的意愿，成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或成立各自的社会主义国家。

四十年代末，一些家境优裕的柬埔寨青年去法国学习，柬埔寨政府也选派了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当时，柬埔寨只有一千多人完成中等教育，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大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院长，秀臣在金边行医收入丰厚；周成当过教育部长，后来又被委任为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乔森潘、胡荣、符宁都连续当选过国会议员，还都担任过内阁部长，他们都表现出卓越的学识和才干。

这些留法学生受到左倾思想的熏陶，大部分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而他们内心又更向往毛泽东暴力革命路线，思想远较柬共本土成员激进。这些留法学生的归来，使柬埔寨共产党如虎添翼，特别是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英萨利、宋成等人，很快就取代了亲越南的本土派人物，从而成为追随中共的狂热领袖。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内战全面开始，除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外，乔森潘是露面人物，胡荣曾经是柬共根据地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符宁主管新闻，宋成是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福财担任西南军区政委。柬共进城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民主柬埔寨”（简称“民柬”）政府的首脑。柬埔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留法学生的手中。

我的家世

我叫周德高，又名林木，一九三二年出生于柬埔寨马德望省思维即村。父亲是从广东揭阳县飘洋过海来的农民，在那里当修筑铁路的挑土工，就这样落户下来了；外祖父是本地的华人，外祖母是柬埔寨人，因此我有四分之一的柬埔寨血统。

我二十一岁时（一九五二年）才从马德望侨校的小学部毕业，后来在马德望地区做事时，中共地下组织假以筹组成立“体育会”为名发展组织，让我读了许多像《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样的左倾书籍，于是我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它的外围团体，还结识了马德望地区华侨领导人张东海和来自越南的抗法人员蔡抗生等人。

马德望原来就有“马华体育会”、“青年会”、“精武会”这样的华人社团，我们成立的叫“群星体育会”，发起人是马德望侨界的活跃人物，活动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互相帮助的风气，使青年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因此会员反而比那些老组织多。社会各界慷慨赞助，事业办得有声有色，在侨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马德望侨党组织推荐我到金边去参加刚创办的《棉华日报》工作，从此我在《棉华日报》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从一个翻译，成为记者、又提升为记者组长、最后成为代理社长和报社经理。一九五八年中国和柬埔寨建交以后，《棉华日报》又成为事事听命于中国大使馆的宣传媒体。我出身贫苦，为人热忱，对党忠诚，愿为共产党赴汤蹈火，因此中国大使馆对我极端信任。

在六十年代初，柬埔寨和中国的关系很好，西哈努克经常访问中国，而且还把儿子送到北京去读书。在这种友好的环境下，《棉华日报》自然也就办得有声有色。六十年代，柬埔寨华侨社会心向祖国，城乡侨校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同志”，这些“成就”都是与《棉华日报》同仁的努力分不开的。

越南战争激烈进行之时，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左倾思潮也就泛滥到外交工作和侨务工作中来，原本亲华的西哈努克开始向右转，一九六八年他封闭了“柬中友协”。我们《棉华日报》发表了一份北京的“中柬友协”致金边的“柬中友协”的贺电，电文调子极高，触动了西哈努克的神经，他下令封闭全部外文报纸，从此结束了柬埔寨自由办报的历史，当然也就葬送了我们的《棉华日报》。

后来，我向一些侨领借钱筹办了“四海事务所”，为侨社服务，又兼做旅行社的生意。我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是在革命的狂热中度过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都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太太是《棉华日报》的司账员，后来又是进出解放区的联络员；女儿机灵沉着，八岁就为我送信到大使馆，一家人都献身革命事业。

中国大使馆的“二王”

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和周恩来一见如故；但是柬埔寨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建立，拖了几年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都追随美国，对中共采取抵制的态度。那时中共为打开外交局面的努力也非常不顺利，能在反共情绪强烈的东南亚国家中打开一个缺口，就更不容易了。而中国大使馆既要处理国与国的事务，还要处理党与党的事务，也就是为“世界革命”出招，因此驻金边大使馆长期是以情报部门为主导的。

柬埔寨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可是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干员却有很大的来头。五、六十年代商务参赞先后是王润生、王树仁，因此我就称他们“二王”。他们都是北方人，知识分子出身，非常有涵养，我很佩服他们，心目中把他们当作共产党员的典范。七十年代，王润生担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王树仁担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驻广州办事处的负责人，那时国内的干部晋升非常缓慢，他们能达到这样的高位，说明原来的地位就很高。

一九五九年，金边——广州直航开通，柬埔寨王国国会秘书长西索瓦·波拉西亲王率领议员代表团参加首航典礼，我则以《棉华日报》记者身份参与其事。当晚，广州举行酒会欢迎柬埔寨贵宾，波拉西讲话，王润生我即席翻译，效果很好。会后波拉西邀请我随团去北京活动，我请示王润生，他对我说：“这样不好，会暴露你的身份，你还是随机返回，我们会另外安排翻译的。”

中苏交恶的六十年代初，王树仁先生接任商务参赞，他为人非常有亲和力。有一次酒会，我也去采访，他悄悄地对我说：“你真是一个柬埔寨通啊！”话中既有玩笑的口气，也有赞赏的味道。当时我还年轻，记忆力很好，大使馆搞不清的柬埔寨政界人事，就常常来咨询我，所以才有“柬埔寨通”的声誉。虽然“二王”都对我非常信任，具体的工作则是由一些“一秘”、“二秘”来安排的。

波尔布特去河内和北京

一九六五年四月初，波尔布特和高明出发前往越南北方，他们徒步跋涉胡志明小道，翻越崇山峻岭，六月中才抵达河内，他们见了谦虚的胡志明几次，但大多是与阴私而官气十足的黎笋讨论工作。在河内期间，波尔布特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历史文件，他说越南方面许多不利于柬埔寨革命的观点，是自从印度支那共产党建立以来就有的，越南人从一开始就想控制寮国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想建立一个一统的印度支那国家。

波尔布特说在他同黎笋举行过的十五次会谈中，黎笋反复对他说“如果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埔寨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的独立自主，越南也不例外”。而在同胡志明的三次谈话中，胡志明也屡次说“越南革命的成功，必须在中国革命成功之后”，意思无非是“柬埔寨革命的成功，必须在越南革命成功以后”。这些不投机的谈话，使他对越南人完全丧失了信赖，因此他向越南方面提出到中国去访问的要求。

波尔布特是在十二月底到达北京的，高明因病在河内留治。接待他的是邓小平，但具体与他会谈的是彭真，刘少奇也接见过他，他住在颐和园附近的“亚非拉培训中心”。他记得彭真赞扬他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波尔布特也赞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中共对小国小党常常不惜赠以“伟大的”赞扬，肉麻但效果良好。几个月后，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相继倒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密锣紧鼓中，波尔布特也注意到中共高层的不安情绪，他尽管没有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与陈伯达、张春桥有了接触，这些文化革命的旗手们甚至表示愿意给予物资援助。当波尔布特离开中国返回柬埔寨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巨大的鼓舞，心悦诚服地拥护中共的路线。

一九六六年二、三月间，他从河内启程回归，四个月后才到达禄宁。因为越南战争的扩大，越共南方局基地从塔墨东移到禄宁的密林中，两地相距仅十余公里。九、十月间波尔布特在禄宁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会上秘密决定将“柬埔寨劳动党”的名称改为“柬埔寨共产党”，这是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一种表示。会上明确了准备武装斗争路线，后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失败和大批被屠杀，更坚定了柬共搞武装斗争的决心。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把“一〇〇办公室”搬到腊塔那基里省，为的是脱离越南方面的控制。

腊塔那基里

腊塔那基里省在柬埔寨的东北角，越共已经在它的东部地区盘踞多年。它与上丁省和蒙多基里省，占了柬埔寨两成多的国土，但只有十万人口，而且几乎都是少数民族。腊塔那基里在北纬十四度线南北，胡志明小道中止在它的东北角；它的东面就是亦称“中央高原”的越南嘉莱省，那是越共的重要基地，也是越南战争激战的战场。

英萨利、宋成、倪萨南等人先于一九六七年夏天到达腊塔那基里，他们在一个叫“安当密”的小镇以南十公里的密林中，建立了“一〇二办公室”，后来又在邻近的密林中建立了一个新的“一〇〇办公室”。十一月间波尔布特来到这里，次年夏天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和宋成的妻子云娅，从金边赶来与夫婿相聚。那时英萨利、宋成、倪萨南分别担任腊塔那基里、上丁、蒙多基里三省的柬共省委书记。

但是，“农村包围城市”并非容易；反而倒像是“革命精英们”的自我隔绝。一到腊塔那基里，疟疾就使他们陷入困境。幸好一位叫“达良”的部落酋长同情他们，才募集了一百多名少数民族青年，组成了一个警卫团。宋成是一个干练的书生，他把这些淳朴的山民训练成了能够战斗的军队，从此他有柬共军队创始人的名声，而且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入金边，他又担任“民主柬埔寨”的国防部部长。

但这帮留洋学生不通世故，却又好冲动。据说不久后就组织山民集体生产，想恩赐给他们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于是与少数民族又发生对立，种下了后来山民部落叛投越南的根由。后来达良也与柬共反目成仇，他认为“红色高棉”是一群过河拆桥的人。

波尔布特从中国回来，更加热衷于“暴力革命”，而且学到了“人民战争”这个新名词。但是他的一厢情愿套在一个“西哈努克死结”中。为了这个西哈努克，不仅越南人反对他发动武装斗争，而金日成还是西哈努克的好朋友；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更情同父子，中国的左派书生陈伯达、张春桥的高调，根本不可能得到周恩来的实际支持。故尔，等待越南夺取战争的胜利，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忍耐”。

红色高棉绝处逢生

一九六九年九月胡志明去世，西哈努克和波尔布特都去河内。西哈努克坐的是飞机，先就参加了葬礼，他告诉越南人，如果要他继续保持“中立”，继续开通支持越共的通道，就必须支持他本人，否则就……。而波尔布特、乔奔娜丽只带了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在胡志明小道上赶了两个月的路才到达河内。黎笋数次会见了他们，敦促柬共赶快回到政治斗争的道路上来，这当然又是些不投机的谈话。

黎笋建议波尔布特到苏联去访问，波尔布特拒绝了，提出要去平壤，但平壤又推说时机不当，连他访问“寮国爱国战线党”的要求，也被“巴特寮”的游击头目们拒绝。显然，河内、平壤穿的是一条莫斯科连裆裤，金日成宁可要西哈努克，也不想见一见这个毛泽东的小喽罗。我们可以想及波尔布特的愤怒，即便常人也很难忍受这样连续的羞辱，因此也就明白他后来为什么会成为越南的死敌，

一九七〇年一月初，这一帮“最革命”的共产主义孤儿去到北京。那时，革命书生陈伯达已经失势，接班大元帅林彪正在谋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无头绪，柬埔寨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优先议题。但是，一个令波尔布特狂喜的消息在恭候他，中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美国和朗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计划，套在柬埔寨共产党脖子上的“西哈努克死结”，将由“美帝国主义”来解开。

当时，越南战争进行得非常惨烈。越共利用越柬边境作为它的后方基地，而中国援越的战争物资又是从柬埔寨的磅逊港（后改名西哈努克港）上岸，然后转运到越共在柬埔寨境内的基地。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扶植一个亲美政府，拔除柬越边境的越共基地，是美国打赢越南战争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约翰逊政府在一九七〇年换届前的拼死一搏。

从一九六三年初离开金边，波尔布特这个农家出身的皇室远亲，已经在丛林中足足煎熬了七个年头。当中共告诉他这个当时世界上最机密的机密，他真后悔自己在河内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更后悔自讨了平壤和巴特寮们的闭门羹。他原本以为自己或许要在丛林终了一生，如今又恰似柳暗花明，寄人篱下的羞涩和自尊，立即化合成了仇恨。

康生亲自指挥，召我去北京

一九六九年底，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我去北京。

刚进华侨饭店，竟碰上前面提到过的蔡抗生，他是越南华侨，一九五〇年接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安排，来柬埔寨组织抗法武装斗争，日内瓦会议后在马德望开理发店，我去《棉华日报》工作，就是他送我去金边的；还有一个叫蔡哲德，是我在马德望国光中学的同事，他们都在五十年代回国，都被安排在华侨饭店工作，蔡抗生还是一个什么科长。大家见面一惊，见到我这个寒冬季节的不速之客，他们立刻会意了，没有寒暄，就让我进了房间。

晚上，中联部的蔡处长来电话，简短地问候了几句温饱，就做第二天的安排，他要我吃完早饭后，出华侨饭店前门左转，不远处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路边，上车即可。在北京的这两天，就是这位蔡姓处长和一位小郭同志和我谈话和布置工作的。而直到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到北京，才了解这次“旅行”是“康老”（康生）亲自策划的。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按约上了汽车，蔡处长已经在车内等候，车开到一条胡同的深宅前

停下。蔡处长好像叫蔡笑农，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吃饭时常常为我挟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周恩来的作风，中共的官员事事都是模仿周恩来的。有一次他与我坐车经过中南海和北海间的那座桥，他对我说：“老周啊，你很幸福，你已经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他朝窗外指着说：“毛主席就住在这里。”我一股暖流冲上了心口，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那时我才不到四十岁，为革命赴汤蹈火的意志，却已不可动摇。

蔡处长谈话非常简明扼要，看来是一个有长期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要我详细报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听完我的报告后，他又问我，有没有出现危急情况的思想准备，有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决心。坦白说，三十多年以前的我，认识很粗浅。只凭一股热爱祖国的心，忠于革命的意志，极少考虑到个人安危，生死已经置之度外。我光明磊落的性格，毫无犹疑的回答，都使得他非常满意。

蔡处长这才明确地告诉我：“美国很快就会指使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的政权。我们要你来就是要你准备应变。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我们相信你有独立应付事变和努力开展工作的能力……”他还特别强调，我不应参加武装斗争，我的任务是要尽量想法留在敌占区，开展秘密活动，如果形势危急，应该先逃到泰国，等局势缓和了，再返回柬埔寨继续工作。

中共指挥我插手金边政局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我从北京赶回柬埔寨，大使馆要我尽快找到柬共在金边的地下组织，并建立一条直线联络管道。按照指示，我很快找到柬共地下党的人，并将中共的意图告诉他们。柬共地下党负责人问我，两党早已有直接联系管道，为何还要另设一条线？我告诉他，情况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希望我能和你们直接联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对方正式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并指定了一个与我联络的专人，这人就是陈绿野（柬名“索山”）。绿野撤入根据地后，接替他的是张允龙，允龙在《棉华日报》当过翻译。

中国大使馆还要我设法将美国策划政变的情报知会西哈努克，希望他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不要离开柬埔寨出国访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以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当面说，何必要用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传递这样的大情报？事实上，当时柬共武装斗争已初见成效，而西哈努克又在与美国眉来眼去，中共不愿在西哈努克和美国之间扮演争风吃醋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考虑，如果西哈努克被右翼分子推翻，柬共的武装革命就可以全面开展，而西哈努克还可能成为柬共的盟友。

我采取两个途径，把情报传给西哈努克了，可惜西哈努克不纳。据说他听了这个报告，反而轻描淡写地说：“轻舟过水无痕，捕鱼后水不浑。”好似有万全之策，其实他是轻信朗诺不会背叛他的。一月七日，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带着一大群随员，去了法国。这是我个人努力的失败；而对西哈努克，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败着。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危亡之刻还眷恋着巴黎香榭丽大道上的法国大餐；而老谋深算的中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政变或许能使柬共更快地取得政权。

情况愈来愈紧迫，有关系的侨领都得到使馆的通知，撤往安全的地方。大使馆一等秘书黄书达通知我到潮州籍侨领杨杰先生那里去领取二十万元柬币的活动经费，这笔钱由国内方面在香港还给杨杰。黄书达也是潮州人，在大使馆的任期很长，这可能与金边潮州帮的势力很大有关。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周，勇敢地独立作战吧！”我很激动而坚决地回答“是！”

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

中国大使馆在几天前就通知我，说很快就会出事了。

三月十八日的早晨，金边很平静，我骑着摩托车朝国会大厦驶去，只见三辆坦克停在国会外面，还有几百个市民聚集在空地上，扩音器传来国会议员的发言，政变已经完成了。我回到自己经营的“四海事务所”，收音机正在广播国会的讨论实况，后来就宣布了废黜西哈努克的决定，金边没有发生混乱。

几天后，各地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没有人提打倒军人政府，口号只是“让王子爸爸回来”，但遭到镇压。

一九七〇年七月政变当局对西哈努克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死刑；十月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柬埔寨共和国”。

中国没有马上宣布断绝与朗诺政权的外交关系，但西哈努克在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途中，获悉中国全力支持他的态度；中国政府依旧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节来欢迎他。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周恩来已经等候在舷梯旁，他还邀请了几乎所有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前来迎接，据说到场的有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欢迎仪式后，周恩来陪西哈努克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也就一手把西哈努克扶到反美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了。

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赶到北京和西哈努克会面。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两日，在广州的一家酒店举行了亦称“三国四方会议”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但对外宣布是“在印支某地举行的”。四方代表是，西哈努克、范文同、苏发努冯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会上成立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民族统一阵线。

一个月以后，在北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元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担任政府首相，乔森潘出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胡荣、符宁出任部长。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二十多个国家立即予以承认；但苏联和法国却再也没有参与，它们看好金边的政变当局，这也造成西哈努克终生对此耿耿于怀。

自从一月份到达，波尔布特一直留在北京，秀木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中国方面与他们密切接触，但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文件上，波尔布特把身在丛林的乔森潘、胡荣、符宁推到幕前，西哈努克对此完全信以为真，他当然记得这三位能干的前议员和部长，但绝不可能知道一个“没有法兰西深度”的留法学生，在北京操作他的命运。

中国和越南对柬共的支持

美国支持的这场政变非但未能遏制越共，反而让名为越共实为北越正规军，打着西哈努克的旗帜，迅速抢占了柬埔寨东北五省，为柬共建立了一片“解放区”。而从一开始，这场政变就受到人民的反对，当西哈努克从北京发出反对政变集团的号召后，形势又进一步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柬埔寨人民本来是要选择纨绔的君王西哈努克，得益的却是与西哈努克临时结盟的红色高棉。

据说，范文同曾经向莫尼克说，越南军队有能力在二十四小时内，帮助西哈努克重新夺回政权。我想，以越南的军力，在十天内占领金边，是完全可能的。而周恩来在“印支三国民族统一阵线”的成立大会上放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我以为也不是空话。且不谈是非，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和越南都把策划的事情进行到底了，只是美国半途而废。五年后，美国全面放弃印度支那，朗诺出走，施里玛达留在金边，他指责美国“没有信用”，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时，中国才宣布断绝与朗诺政府的外交关系。中国大使馆通知柬埔寨的华侨干部，要他们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获得这个指示后，侨干及男女青年一千余人很快就撤入“解放区”，开展支持柬人民的抗战活动。而朗诺、施里玛达的新政府还以为中国会继续维持和他们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苏交恶已久，中共的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恶劣影响，使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地位。印度支那三党中，越共持亲苏的立场，寮共亲越，因此中共竭尽全力争取柬共，而华侨又是中共手中的棋子，它企图以华侨干部群众参加柬共的工作，来壮大柬共的声势，最终也能达到控制柬共的目的。

然而，这是一个如意算盘，柬共追随中共的极左路线，却对中共有所戒备，特别是英萨利长驻北京，在他控制西哈努克的同时，也深知中共对柬共的控制欲。因此，进入“解放区”的华侨干部和群众，实际上被柬共长期冷落。很早就被隔离于柬共政治之外，这或许是因祸得福，我们在柬共的残酷内斗中牺牲较少，而那些加入柬共的同志，就牺牲惨重了。

柬共的干部

我出生在柬埔寨，为中共工作，也与柬共领袖人物有过接触，甚至还救过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头面人物，但我没有参加过柬共的组织活动。柬共的领袖给我最好印象的是苏品，他亲切、和蔼、豪爽、真挚，不把我们当作外人；而同样出自柬共本土派的中央副书记农谢，就予人非常恶劣的印象。柬共的最高层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其基层的“翁卡”干部，不少是地痞流氓，他们趁革命的到来，也沉渣泛起了。

柬共的高层干部，文化程度非常高，高过了中共、越共。这些留法学生中以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三人在柬共真正有地位，乔森潘、胡荣、符宁、周成等人虽然在柬埔寨政坛中名气很大，在“解放区”名望也很高，但在柬共内部却不能进入核心圈子，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会议也不得参加。而秀木、秀臣、秀春、秀蒲拉西兄弟都是忠于柬共的正人君子，要让他们去做小人的事情，他们又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没有见过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波尔布特能够在这群留法学生中出人头地，必有其原因，据说他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不仅意志坚定，而且富有魅力，耿万萨看不起他，我以为是没有道理的。宋成可能是柬共中最能干的人，他既是柬共军队的创建人，也是肃反的实际主持人，他的妻子云娅还是柬共情报首脑。英萨利是一个不善与人相处，遇事机会主义，喜欢推卸责任的小人，他后来首先叛变，也并不偶然。乔森潘则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曾经救过他，但我在“解放区”见到他，他却唯恐让人看见他与中国人有关系，连过来与我握手的胆量也没有。然而，这些留法学生的共同特征，就是思想极为左倾。

抗法时期就参与斗争的柬共领袖，以农谢、苏品、高明、塔莫、莫森巴、温威等人的地位较高，这些人中，除农谢、塔莫，其余四人后来都被杀害。我与高明最熟悉，自一九六五年陪同波尔布特去越南访问，高明就一直担任柬共驻河内的代表，渐渐脱离了核心圈子。我与塔莫也有交往，他看上去也并非是一个凶恶的人，以他予我的稳重慎言的感觉，我万万不会料到后来行事的毒辣。我想，柬共聚集在波尔布特的错误路线下，与绝大部分本土派领袖的左倾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不能因为后来他们大部被杀，就认为他们代表了正确的路线，据我所知只有苏品和胡荣是思想比较右倾的人。

柬共进城

美国决定全面撤出印度支那，一九七五年开始，停止援助金边政权了。四月五日朗诺出走美国。四月十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降下美国旗。四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是柬埔寨新年，柬共没有进城，金边的市民照样过了一个传统的佛历新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解放”金边，身着黑衣的柬共部队（人称“乌衫兵”）进城，而朗诺军队早就溃不成军。

柬共入城不久，便向全国广播，说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将轰炸金边以及各大城市，请市民收拾一些细软和随身用品，暂时离开城市，数日之后就可以回来。一周后，两百万居

民悉数撤尽，其中即有华人四十余万，金边遂成空城一座。

四月是酷热的月份，几百万市民拥塞在几条出城的公路上，根本就没有目的地，被逐出家园的金边市民带不了什么财物，只能带一些现钞。可是，柬共紧接着宣布废除货币流通，现钞顿时变成废纸。许多家庭已经断粮，老弱开始病倒路边，到处是被遗弃的尸体，和混乱、呼叫、嚎哭、哀鸣，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一时间柬埔寨变成了人间炼狱。

疏散过程中，演出了无数惨剧，有的家庭等候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不愿离城的躲在房内，竟遭炸弹炮击；医生、护士为了抢救病人，延误了撤离时间，便死于枪下。百万市民匆忙出城，所备食品不多，许多人饿毙途中。妇女更经受不住行途折磨，老年妇人死亡比例尤大。到达偏僻乡村或荒芜密林后，又有许多人死于霍乱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占、喷吓、柴桢、菩萨、磅清扬、茶胶、磅通、磅逊等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山区迁移。各地柬共都规定了最后期限，不按时离城者，格杀勿论。而自一九七六年起，柬共又将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度迁移，其中以徙往马德望省的居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柬埔寨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极高。

波尔布特竟自我表彰说：“驱赶所有人离开城市，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能做到的伟大创举”。数年之后，有记者访问塔莫，他解释驱赶城市人民一事说，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能力比较弱，没有办法搞清敌我关系的具体情况，只好把城市人民统统撤离到农村，一举打乱敌人，来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

这本是柬共蓄谋已久的“革命创举”，可是除了波尔布特和塔莫外，其它柬共领袖都肆口抵赖。那位身为柬共第二号头目，领导城市工作的农谢，一再宣称柬共的事情都是“集体领导”；而身为“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的乔森潘，竟一概不认账，最近他还说他是进金边的路上，见到跋涉的民众，才知道这回事的。

后来，柬共不仅实践中共实践过的“人民公社”，还实行中共没有实行过的“婚姻配给”，真是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它又将高棉人民分为“老人民”和“新人民”两等，前者是原来的农民，后者是城市居民转化成的“准人民”，而一些柬共农村干部又对“新人民”施行了令人发指的奸淫掳掠，柬埔寨真的成了一个十足的地狱中的人间。而毛泽东曾经这样地夸奖波尔布特的恶行：“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

柬埔寨华侨的悲惨命运

五十年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国内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海外华侨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即便了解也很肤浅，而且总是被“祖国强大了”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口号和假象所欺骗蒙蔽。我就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亢奋情绪下，而投身到中共的怀抱中去的。整个华侨社会又以中共支持柬共，而取了一种“凡是祖国支持的，我们就要拥护”的“爱国主义”的盲目态度。

然而，自从柬埔寨共产党成了中共的“友邦”，柬埔寨华侨就是没有价值的“家奴”了，依了“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封建传统，中共就把全部柬埔寨华侨，也包括我们这些几十年来效忠它的侨干，一并赠与柬共了。中共曾经正式通知我们“以后你们和中国没有关系了”。从此，我们就成为海外孤儿，任柬共刀俎宰割的鱼肉。

几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的世界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发财致富的口号响彻云霄，纽约某些“同乡会”中，有许多人在为中共大使馆、领事馆摇旗呐喊，他们觉得“祖国强大”了，“热泪盈眶”了，做中国人“有面子”了，要和“反动分子”和“敌对势力”勇敢斗争了，其实内中许多人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我们当初却是一些为世界革命不惜抛头颅的胡涂虫。

在中共的心目中，华侨是世界革命的大棋盘中的小棋子，当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任务，主要是策动柬埔寨革命，而不是保护侨民；至于“团结华侨”的工作，也不过是策动革命的大目标中的小动作。而中共最重视的，还是与柬埔寨王家和政府的关系。到了柬共统治的时期，中共心目中只有“兄弟党”，牺牲心向祖国的侨民，他们就在所不惜了。

柬埔寨人民经历了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劫难，而当地华人又首当其冲。西哈努克时期，全柬华人共约七十万，柬共执政的三年又八个月，有人估计华人共死亡三分之一。回首往事，为造就“心向祖国”的局面，断送华侨社会安定的生活，我虽非首恶，但亦为犬马，每当念起这些，我就陷于极端痛苦的内疚中。

柬埔寨的华人大部经商，经济能力一般高于普通民众。然而，柬族民众虔信佛教，心地善良；华人社会也恪守儒家信条，柬华两族非但没有“阶级冲突”，反而是“水乳交融”。但是从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来看，华侨都是“剥削者”，而柬共学习中共的阶级分析，宣传“华侨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资产阶级”，因此华侨面临着比柬族更为险恶的困境。

一九七七年六月，柬共宣称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且要各级组织注意“散布反动言论的人”和“懒惰的人”，说前一种人是反革命的后备军；后一种人是剥削分子的根苗。一九七八年，波尔布特变本加厉地开展“肃反”，殃及到商人、医生、教师，乃至残疾者；而华人中的商人、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受害尤深。许多柬共华裔党员、干部遇害，张东海、苏灼、吴植俊、密娟……无一不是冤魂。

因为柬共的排挤，我们没能回金边，柬共看中共的面子，对我们这些“华运”干部还算过得去。但华侨有时能碰上几个中国援柬专家，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大都是要他们“顾全大局”、要“忍耐”；甚至还有援柬人员认为华侨是“剥削阶级”，当面训斥他们要好好接受柬共的管教，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还听说，有许多华侨冒死去金边，向中国大使馆哭诉求救，而大使馆给他们的答复都是：“要听从从当地政府的安排，遵守柬埔寨的法律。”难怪有人说：“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全面整肃的启端

待柬共进入金边，将城市居民驱往农村，赶尽全部越南侨民，杀绝朗诺政权人员，庙宇关门大吉，波尔布特的错误就统统浮上台面。于是，党内的反对意见抬头，波尔布特意识到他的领袖地位受到挑战，便开始整肃内部，全面消灭异己了。然而，事端却是出自一件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柬共的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谈论党史的文章，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就成立的，波尔布特认为这是有意贬低他、抵毁他。原因是，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在金边的那次代表大会上，他才成为党的中央成员，杜沙穆担任党的总书记，农谢和他两人是助理书记，一九六二年杜沙穆被害失踪，他才转正为总书记。以前的党的领导集团中没有他份。所以他就不承认一九六〇年之前的柬共历史。

这个心胸狭隘的总书记认为，是有人利用党的成立的时间，来与他论资排辈；他可能盘点了党内的营垒，农谢是他的同伙，英萨利是他的姻亲，宋成是他的亲信，胡荣已经消灭，乔森潘是个机会主义者……，只有老抗法人员，才能与他较量。于是他就称病离职，让农谢代理操办，农谢先把高明和东北大区书记倪沙良抓起来。高、倪两人莫名其妙，还以为是误会，高明写信给波尔布特，表白忠于党、忠于大哥，期望大哥明察。

高明在党内成名很早，学生时代就参加越盟的抗法斗争，一九五〇年三月为建立柬共，在越柬边界港口城市南河仙举行预备会议，高明与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就都是与会者。一九六〇年的党代会上，他当选中央委员。一九六五年，他陪同沙络绍（波

尔布特)去越南访问,后来就一直留在河内担任柬共代表。

逮捕高明和倪沙良之后,波尔布特又向中央委员高莫尼和驻越南大使谢安下手,因为他们和高、倪两人的关系很好,他们后来一起被处决了。这批高干的被处决,对柬共党内的震动太大,同情他们的人很多,不满的情绪在酝酿。于是,波尔布特利用一间金边中学的校舍,组建了一个专职审讯的S-21肃反监狱,任用他的一个磅通省的同乡,名叫“密杜”(真名江吉耀)的华裔干部主事。“密杜”心狠手毒,他指使杀害了约两万多名柬共同志,那间校舍后来成了堪与奥斯威辛齐名的S-21监狱。

第二次被召去北京

一九七七年四月,柬共川龙县委书记密春开了一辆摩托车来到我家,我们住得很近,也经常在路上相遇,但从来没有打过招呼。这次他登门是来通知我,要我带全家去北京,而且他还派了一艘可以坐一百多人的小客轮把我们一家人送到金边。到了金边我们先住在一间招待所,第二天转到原大臣甘德的别墅,那是柬共外交部管辖的屋舍。我在那里遇到吴植俊,他用柬语对我说:“外交部已经得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你马上去北京。”那时,他是民柬外交部的干部,也是波尔布特的贴身翻译。柬埔寨华人中,他可能是最得意的一位。

第三天,大使馆傅学章开车来接我们,他于五十年代就到金边来学习柬语,一九六三年破获台湾特工时,我写的匿名信还是经过他修改的,因此互相熟悉,久别重逢,相见甚欢。他驱车绕金边一周,只见萧条肃杀、面目全非。到了大使馆,孙浩来迎,五十年代他就是大使馆的“一秘”,现在荣任大使,在饭席间他直率地对我说:“英萨利这个人很坏,很反华。”这可能与“四人帮”倒台后英萨利有很多反对议论有关。

自柬共进城,至中共召我去北京,足足隔了两年。此间,中国援柬专家有数万人,对柬埔寨的鼎沸民怨,柬共内部的人头落地,他们不可能没有与闻,但“四人帮”绝对信任柬共,根本没有倾听各种意见,了解实际情况的愿望。我去北京时,“四人帮”已经倒台,虽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中共反省错误路线的呼声已经高涨。

外交部和中调部

我们一家人是乘飞机直达北京的,到飞机场来接我们的是中调部王涛处长,他先把我们安排在北京饭店,一个星期后才转到地安门中调部招待所。

在北京饭店住的时候,王涛说外交部想听一下我的报告。那次我是在领事司做报告,有六个人来听,其中一位身材高高、皮肤白白、风度很好的女士,说是“亚洲司司长”,她说自己“姓龚”。可能是乔冠华夫人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因为龚澎在一九七〇年就故世了。还有两位原来在驻金边大使馆工作过,我认识他们,但名字记不起来了。

听了我对柬共一路直言的批评,这位女司长倒还算很客气,她很含蓄地说:“你报告的情况,好像与伍某某同志说的有点不一样……”伍某某就是“老伍”,他已经先来过了。当然,老伍是“老同志”,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有更多的了解,他的汇报难免有所保留,而且他对柬埔寨社会的下情也未必了解很多。

我不知道孙浩大使是外交部系统的人,还是中调部系统的人。以为孙浩对英萨利、宋成等极坏的看法,就是对波尔布特集团的否定。如果外交部不相信我的话,还情有可原;难道他们还不相信孙浩吗?但中共一贯是以“立场”看问题的,那时“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他们支持柬共的立场,却还在继续坚持中,我的话他们当然是听了不愉快的。

最后,我告诉这位女司长,柬共非常残暴,希望能将一些有危险的同志接回祖国来。她一脸无奈地说:“回来很难安排。”我说:“他们不会有好高骛远的想法,要他们到新疆去,

他们就会到新疆去的。”她又说：“困难很多啊！”时到如今，我还认为华侨和侨干的大量牺牲，与中国外交部的漠不关心有直接关系，中国外交从来没有把保护侨民当作自己的使命。

接着，中调部的领导要我写一份关于柬埔寨的情况的详细报告。当时，我对柬共深恶痛绝，但对中共还有许多美好的想法，以为自己总算是回到了亲娘的怀抱，而对中、越两党的对立也完全没有了解，因此希望自己的报告能引起中共对柬共错误路线的注意，并尽快将处于困境和危险中的华运同志调回国内，避免无必要的牺牲。完成这份报告已经是六月初。

我的报告引起了上级的重视，一位“高局长”曾经对我说：“你提供的×百四十九条（记不清楚是几百了，只记得尾数是四十九）情报，虽然有些我们需要核实，但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情报人员，关于你的职务级别，我们稍后再做决定。”他还说：“根据你的情况，还是到海外去工作的好，北京冬天很冷，你先到广州去等候，我们把事情安排好了，你就先去香港。”

我那一阵很风光，隔三岔五地就有科长、处长、局长、主任来问寒问暖，请客吃饭。但是王涛有一天突然对我说：“读了你的报告，愈读愈发现你是反对柬共的。”中调部发现了我的情报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了我反对柬共的立场，领导上与我的关系就开始冷淡下来了。看来中调部、外交部都支持柬共的立场，我也就开始有点灰心了。

后来，当我再三提出将统战人士林宏毅、杨碧陶，生病的洪觉民，以及很可能被柬共杀害的洪德一家撤回国内来时。王涛竟而拍桌子大骂：“你太没有组织纪律性了，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完了。为什么老提那些问题，你目中还有没有中央？就算将来要撤什么人，也不是照你周德高的意见办事，那是中央的决定。”

我太太和我还被送到延安和大寨去参观，在大寨接待我们的是陈永贵的一个副手。“十一国庆”还上了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部里有人关照我，观礼时如果有摄影机对准我，就应该回避，不要暴露了自己。对于一个海外工作人员的观点，他们也未必看得很重，他们希望今后还能利用我。然而，我提供他们这么多的情报，非但没能帮助他们，反而像是将他们推进泥坑去了。

苏品被杀

我的报告中有一则是苏品与越南方面有联系。苏品在抗法时期的战友“阿保”，一九五四年去了越南，政变后没有返回柬埔寨。阿保与越共中央关系密切，也是老伍的好朋友。一九七四年底，我去社马见老伍，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苏品曾经两次派人来找阿保，要求越南方面干预柬共的胡作非为，而阿保也已经向越南中央通报，但均未被采纳。我向中共报告这个情况，当然是出自对苏品的同情。

高局长说我提供的情报，有的“需要核实”，可能就是这一条，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日，也就是我完成报告后的一个月，时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的苏品（主席乔森潘）和西南大区书记朱杰，就被邀请访问中国。当时苏品仍然主掌东部大区工作，而且是负责对抗越南的七号公路地区的军事总指挥。

尽管，我报告的是苏品在柬共进城前与越南的关系，但中共却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这些“亲越派”的态度。因为前一年前清洗高明、倪沙良、高莫尼、谢安等人的严重事态，而苏品和朱杰又对中越两党的矛盾没有深入了解，在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他们可能表达了对波尔布特集团某种程度的不满，于是也就印证了我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

紧接着，一九七七年九月底至十月初，波尔布特和温威等访问北京和平壤，当时掌权的华国锋对波尔布特大加赞扬，他说：“尊敬的波尔布特同志，您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请您继续走下去。”中共方面意识到，如果柬共内部的反对派与越南合作，将打破它的战略安排，因此就向他们通报了这些动向。一九七七年“十一国庆”，我站在观礼台上，回头见到

波尔布特和华国锋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为了不暴露中共的角色，苏品和朱杰回到柬埔寨后，波尔布特没有立刻对他们下手，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先抓了朱杰，五月份才开始对苏品下手。这件事与邓小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而是华国锋的安排，然而柬共为此加速败灭的后果，却要由邓小平来承担了。

同年四、五月间苏品在金边住院，他的军事副手盖宝在东部大区开始清洗，除了被就地处决的以外，还有四百余名涉嫌的柬共军人被押往金边S-21监狱。密杜曾经报告农谢说监狱人满为患，农谢则指示他不必再细问，统统杀了就算了。据盖宝说，波尔布特和农谢曾经亲自召见他，向他出示朱杰的与苏品密谋叛乱的供词。盖宝进而传唤苏品，苏品派人与盖宝沟通，但去者皆无还。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苏品忍无可忍，要去金边弄清是非。他的部属，柬共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委韩桑林说，他曾经劝苏品不要自投罗网；但苏品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带了四名警卫去了金边。苏品一行来到湄公河边的水净华渡口，他派一名警卫拿着他的亲笔字条去求见波尔布特，可是这名警卫一去不复返。没多时，金边开来两艘汽艇，汽艇泊岸后，二十几名武装人员登岸快步冲向吉普车，并开枪扫射。苏品腹部中弹，负伤逃至湄公河畔一间庙宇中，但失血过多，伤势严重。

金边方面派飞机散发传单，命令当地军民缉捕苏品归案。六月三日，他属下的一名团长拿着一张传单去见苏品。他自知来日无多，对下属说：“我不行了，往后的事情只能靠你们担当了。”说着拔出手枪向自己胸部开枪，再把枪口塞进口中再开一枪。苏品死后，他的妻子儿女及乡里七百余人被杀；他的儿女亲家，西北区书记莫森巴一家也被株连，全部被杀。

揭竿而起

苏品是柬共内部威望甚高的领导人，而且长期领导东部大区的军事政治，他的死使整个东部大区人心震撼，而紧跟而来的清洗，又把他的部属韩桑林等人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波尔布特调塔莫的西南区部队前去镇压，韩桑林兵败，率部退入越南境内。塔莫杀红了眼，数万人民群众也逃去了越南，他们后来在越南境内扯出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旗帜，训练出了自己的军队。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的领袖人物中，韩桑林原本是东部军区第四师的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谢辛是第四师的一名后勤干部，而最杰出的就是后来在金边长期执政，而又表现出卓越政治才干的洪森，他那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营团级指挥员。一九九三年，联合国主导的柬埔寨大选后，西哈努克重新担任国家元首，他首先授这三人以“五星上将”的殊荣，以表彰他们十五年前造反的功勋。

韩桑林等起事后，柬越发生正面冲突，东部大区大批群众逃亡越南。波尔布特对此恨之入骨，他将柴桢省边境上的人民集中起来，又向中国订了几百吨绿色布料，这些布料在两周内分五批运到。柬共将它们裁缝成衣服和水布，柴桢省边境人民每人配给一套，再用卡车将这些穿绿色服装的人们运到金边，然后用火车转运到菩萨省。这几千名“绿色坏人”无处逃遁，就在菩萨省的土地上被消灭了。

邓小平教训波尔布特

当时，中共对柬共的倒行逆施不能说没有了解，但邓小平和华国锋正在交接权力，内部的思想一片混乱。然而，帮助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集团整肃苏品，引发柬共内部叛乱，推动柬共政权加速崩溃，其后又让中共头痛了二十年。

一九七八年初，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出访柬埔寨，要求见西哈努克，但柬共只让她在西哈

努克的寓所外绕了一圈，对这位政治老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但邓颖超和她的先夫周恩来都以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著称，她在离开金边前发表一次广播讲话，她说：“在高山上，有许多树，其中一株长得比别的树高而大，因此免不了要受到强烈的风所吹袭，但不管强风如何使劲地吹，这株大树依然傲立挺直不动，最后终于战胜了这个恶运。”尽管她的言辞美妙，但柬共的恶运却难逃了。

一九七八年夏天，东部大区军民叛乱后，越南也加紧了应对的步伐，九月间范文同出访新、马、泰诸国，争取同情和支持，但空手而归。接着他与黎笋赶到莫斯科，与勃烈日涅夫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约。山雨欲来，柬共是热锅上的蚂蚁，七月份宋成访问北京，八月份农谢访问北京，九月份下旬波尔布特也赶来拜见邓小平，如日中天的邓小平接见了这些曾经好高骛远，如今却失魂落魄的高棉英雄。

当时柬共驻北京大使毕姜（现在金边）回忆了邓小平与波尔布特的谈话。邓小平开始大骂越南忘恩负义，接着就教训波尔布特，说柬共的困难是自己过左的路线造成的，邓小平还告诫他统一战线和团结西哈努克的重要意义，在谈到越南可能入侵时，邓说抵抗越南的战争要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担当，中国不可能派兵到柬埔寨去。毕姜说波尔布特在聆听这位“修正主义分子”的教训时，始终保持着微笑的姿态。

波尔布特还没有回到柬埔寨，九月二十八日金边就传来了乔森潘宴请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的消息，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了两年多的时间。这究竟是在取悦强人邓小平，还是在取悦弱者西哈努克？我们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但邓小平和西哈努克，对柬共都是有用的人。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面对来自北方强敌与越南的威胁，重新上台敢于拍板的邓小平亲自出马，十一月间他赶到东南亚，他承诺停止对马共、泰共的支持，宽慰了这些反共国家，使它们站在反对越南的立场上。同时，中共要人汪东兴、胡耀邦赶到金边，汪东兴建议柬共储备粮食，发放武器给人民；而明智的胡耀邦看到的是宴会进行时，金边又断电的一片乱象。最明白世道的，莫过波尔布特自己，如果把武器发给人民，等于把武器发给敌人。

英萨利回忆，十一月一、二两日柬共匆匆召集了一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由七个人组成的“中央常委”，其排名如下：波尔布特、农谢、塔莫、英萨利、温威、宋成、宫苏潘。十一月三日上午，塔莫、温威、宫苏潘三人在一起议事，突然一群持枪的军人冲进室内，吓得塔莫把大小便都屙在裤裆里……，所幸抓走的只是温威和宫苏潘。时仅一日“七人常委”就只剩下了五人，柬共的清洗还在随心所欲的兴头上。这时，离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南的入侵，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波尔布特在最后的日子里，曾经对西方记者这样说：“我知道有很多人怨恨我，并要我对‘种族灭绝’行为负责，我也知道很多人因此而死。”他接着说，“我应该向所有发生过的事情负责，因为这个路线政策太左了，我没有及时发现到各方面的失误，及事态的严重性。其实我就是像一个家庭主妇，不知道下面孩子干了些什么，我太相信一小撮人了。例如负责执行中央决策工作的秦森瓦，负责知识界工作的倪沙良，还有负责政治教育工作的苏品，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人，但结果他们给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波尔布特不但将责任卸得一干二净，而且还要让被他杀掉的三个“亲密战友”，来替他背黑锅。他说东说西，有一件事情他是万万不能说的，那就是他杀死苏品是来自中共授意，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撤出金边后，要将涉及机密的中文翻译人员尽数杀绝的原因。

柬共逃出金边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救国阵线”引路，久经战练的越南军队，分七路打进柬埔寨。越方原有以湄公河为界，两方割治的想法，但只出手几天，柬共就不堪一击，全面

溃逃，波尔布特被逐出金边后，逃至柬泰边境苟延残喘。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金边易手，次日“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就宣告成立，它的早期首脑就是韩桑林、宾索万等人。

被逐出金边的柬共主力，盘踞在连接戈公、马德望、奥多棉吉、柏威夏诸省的柬泰边境地区，中国政府很快和泰国达成协议，以放弃对泰共武装的支持，换得取道泰国支持柬共的条件。泰国政府在柬共和越南间，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在它的默许下，柬共人员可以越界逃生。因此，在马德望省的拜林、梅莱，奥多棉吉省的安隆汶三地，形成柬共十年“抗越斗争”（一九七九—一九八九）的中心。此间波尔布特就躲在拜林和梅莱之间的山区。

描写柬共逃出金边的纪事很多，据说情况混乱已极。英萨利是赤脚上了去马德望的火车，然后步行进入泰柬边境的山区，孙浩大使带着大使馆的官员与柬共外交部长英萨利同行，以示中国与“民主柬埔寨”同生死的决心，英萨利向萧特提供的一张路途上的照片，每人都是一副重上井冈山的打扮。这无疑很令人感慨，三年多以前两百万人民被赶出金边，今天就轮到了柬共自己。

多少年后，国际上还有越南侵略了柬埔寨，越南军是侵略军的舆论。然而，柬埔寨人民也是取了“两害权其轻”的原则，非但没有把越南军队当作侵略者，而且欢迎他们，感激他们，还带领他们去抓捕躲藏的柬共分子。西哈努克就说过：“如果越南人不对红色高棉发动进攻，那我们的人民就将永世地被那野蛮的‘翁卡’统治，永远当奴隶了。”

在柬埔寨的奥斯威辛怀旧

一九九九年，我从美国回柬埔寨，有机会参观那座用中学校舍改建成的杀人魔窟 S - 2 1，现在它已经向公众开放。这个柬埔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密杜”的主持下，前后关押杀害了约二万人，他们绝大部分是柬共的成员，只有六人幸免于难。由于柬共仓促逃出金边，魔窟的档案和死者的照片都保存完好，囚者大都被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越南”的特务，甚至“刘少奇派修正主义分子”，其诬陷捏造的荒谬程度超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波尔布特许多“亲密的同志”，都死于 S - 2 1，民柬副总理温威是波尔布特参加印支共产党时期的老战友，在他担任副总理时，曾陪同波尔布特访问中国和北朝鲜，两人经常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他的被捕与他的前任上司苏品有关，在杀他之前，波尔布特亲自参加审讯，并对他拳打脚踢，死前温威先被打断了一条腿。

符宁在西哈努克时期曾任司法部长，后来又在民柬政府担任新闻部长。西哈努克认为，论才学和智慧，乃至人缘和礼仪，符宁都远胜于英萨利。他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他进城后提出体恤人民疾苦和发扬党内民主的意见，因此不能见容于波尔布特。在一张铁床两边有两副手铐和两副脚镣，讲解员说那是符宁被处决前睡的床。

我的悲愤从心中迸发出来，脑中闪现了在六十年代中国大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符宁和凌秘书在谈话，我在一旁做翻译。一个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一个说我们坚决斗争到底，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美好的话语余音缭绕，可是符宁却被革命巨兽吞噬了。

出席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的柬方抗法人员代表农顺，后来担任金边《人民报》总编辑。一九五八年被政府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政变后被朗诺政府释放，到“解放区”在柬共内担任要职；而革命成功后，当年与他不和的《人民报》的排字工人塔莫，成了波尔布特最主要的亲信，身居柬共要职，因此农顺也在 S - 2 1 被处决。

秦森瓦是波尔布特的随从，在东北根据做油印工作时，得到波尔布特的信任，进城前就被提拔担任柬共中央办公厅厅长，进城后担任总理办公厅主任。象这样亲近的人，也被波尔布特处决。而与我认识的苏灼、张东海等，也统统死在里面。

苏品案发以后，S - 2 1 囚犯大增，处决也加速进行。这座原来是中学校舍的走廊上，

陈列了数千名被杀者生前的相片，这些表情绝望的死囚绝大多数只有编号，没有名字，但我认出不少过去的熟人，其中一位是金边中华医院护士陈萍，她是柬共党员陈绿野的妻子。照片上她身穿黑衣，怀抱一个小孩。一九七〇年我从北京回到柬埔寨，奉命与柬共中央建立直线联系，第一个接头的就是绿野，后来绿野在“解放区”死于疟疾。陈萍一定是因为温威—苏灼这一条线的牵连，而被清洗了。

狄蒙女士，是一个留法的生物学博士，是很少有高学位的柬埔寨女性之一，西哈努克曾经任命她担任劳工社会福利部部长，我在《棉华日报》工作期间访问过她多次，有时她在国会受议员质询时，我也在场，她是一个难得的机敏干练的才女，一个心气很高的单身贵族。她的思想左倾，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柬共的成员，在S—21的死者照片中，我发现了她。

红色高棉的囚徒

一九五五年八月“万隆会议”开始，西哈努克就结识了周恩来，中柬关系就翻开了爱恨交织的篇章。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〇年，堪称是中、柬关系的蜜月期。西哈努克多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刘少奇、陈毅、李先念等，也先后访问柬埔寨。高层互访之频繁，实属罕见，而民间文化交流和往来就更加密切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常以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有别于政府间的关系的道理，长期支持泰国、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共产党的暴力武装，因此这些国家长期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而在苏加诺和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保持与中国和西方的等距关系。五十年代，中共在东南亚的处境相当孤立，柬埔寨是一个难得的“友邦”，对于在柬埔寨推行革命，中共最初还是有所节制的。

柬埔寨的共产革命惨剧，是中共影响的苦果，也是越南战争的结果。越南战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冷战中的一场热战，柬埔寨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对象，西哈努克也只能在它们之间走钢丝。但把西哈努克踢出柬埔寨，却是美国发动政变的错误。

中共倾力促成西哈努克和柬共联合，西哈努克名义上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席，也是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元首，其实他只是一个红色高棉的囚徒。中共将他和柬共捆绑成为一对“夫妻”，而柬共根本就不把西哈努克放在眼里。负责监护他的英萨利，对待他连起码的尊重和礼仪都没有，尽管莫尼克和英萨利之妻乔蒂丽，还是在西索瓦预科的同学。

西哈努克说到，中国政府给他维持着很高的生活水平，有一次他在食用法国鹅肝时，一个柬共干部竟当面指责他说：“这是人民的血汗。”西哈努克顿时大光其火，回答他们说：“这不是你们的血汗，而是中国政府给我的。”其实，这是他自己花钱买的。西哈努克很早就向周恩来表示，他要与柬共分手，要回柬埔寨去斗争。周恩来表示很理解他的心情，要求他千万别让在前线战斗的战士和人民，因为他退出政治舞台，而失去战斗的意志。

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当和事佬。他曾经当着西哈努克、莫尼克、宾努、乔森潘和乔蒂丽说：“亲王殿下，我很清楚殿下和你的柬埔寨共产党同志们有不少误会；但是请诸位别忘记了你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一些分歧毕竟是小事。”西哈努克无奈，只好微笑。乔森潘也报以微笑，西哈努克说那是笑里藏刀，令人心寒。毛泽东还开玩笑地说：“亲王殿下，你讲话很坦率，你有资格当共产党员。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员吧！”

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为了帮助柬共小伙伴，才将西哈努克捆在柬共的战车上的。西哈努克曾经指出：“我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我的支持，他们就很难得到农民的支持。”一九七五年九月，西哈努克获准返回柬埔寨前，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当时，周恩来已经病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着前来迎接西哈努克的柬共代表团成员乔森潘和乔蒂丽，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

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因此而引起的灾难性的后果负

责。我想对你们提出一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做法，那肯定会给你们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当然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一跳就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再蹈我们的覆辙。”

这一段话见诸于中国出版的《波尔布特》，很多人会以为这是死无对证的捏造，是中共在推卸自己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以为一个“行将就木”的“革命老人”，说些“其言也善”的话，是相当可能的。可惜这些惨痛的教训，被“初出茅庐”的柬共领袖置之脑后。

中共对柬共进城前的内部斗争，对柬共的极左思潮，不是没有察觉。然而，柬共的这些错误的根子在于中共，在于毛泽东思想。而当时中国自己正在进行浩劫式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己不正”的状况下，又如何能够去纠正更加左倾的柬共呢？事实上，我们也不妨问问周恩来：当中共在犯那些错误的时候，你周恩来又在干什么呢？

西哈努克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和在柬埔寨农民心中的崇高威望，都被柬共利用了。在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前，东德驻北京大使（前驻金边大使）的夫人，当时是含着眼泪劝西哈努克取消回国的决定，说他们认为返回柬埔寨后，亲王本人和王族成员都将遭遇不幸。西哈努克没有接受忠告，终于回到他的祖国，去承受了三年软禁生涯。在当时，东德与苏联是站在越南一边的，然而，事实证明，东德方面所表达的判断是正确的。

回金边后，西哈努克自己的居住环境极其恶劣，老鼠成群结队，水电时有时无。他说他终日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有时竟无聊到观看壁虎交配来打发时间。后来西哈努克情绪失控，乃至与乔森潘争吵；莫尼克也精神崩溃，不时发抖。西哈努克的近二十名子孙被柬共杀害，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偷藏了一条大绳子，准备在浴室上吊，也常备大量安眠药，随时可以服药自杀。”西哈努克夫妇能逃过大难，也算是奇迹。

说到莫尼克，她有意大利血统，在一九五二年举行的一次选美会上，莫尼克貌压群芳，使西哈努克一见钟情。莫尼克为西哈努克生下两位王子，大的叫“西哈·莫尼”，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国王，其人知情达理，孝敬父母，曾留学北朝鲜，金日成也很疼爱他。西哈努克被柬共软禁在金边时，柬共以假电报召西哈莫尼回金边参加纪念活动，于是也失去了自由，他曾经抱住父亲的双脚，要求父王将自己交给柬共，来换取父母的自由。次子“诺灵·狄奉”，留学苏联，思想亲共，与西哈努克作对作到水火不容。他甚至对波尔布特没有把西哈努克杀掉，感到不理解。当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时，小王子把西哈努克闹到忍无可忍，最后求助中国政府将他送去法国。

西哈努克在美国谋求政治庇护

一九七三年，西哈努克视察“解放区”时，波尔布特不让他知道谁是柬共的真正领袖；他回到金边后，波尔布特本人根本不去见他，而且还对人说过：“西哈努克对革命有些贡献，因此我们才免他一死，否则还真想杀掉他呢。”一九七九年元旦一过，越军兵临城下，一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请西哈努克到政府大厦来喝茶。

西哈努克到时，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已经站在政府大厦门前等候，波尔布特行弯腰合什礼，傲慢无比的英萨利，也只得跟着照办了。这是西哈努克访问“解放区”以来，第一次再见到波尔布特。波尔布特显得很有魅力，他用皇家和僧侣的称谓和用语与西哈努克交谈，这被认为是一种非常高贵的方式，乔森潘也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同西哈努克讲话。

波尔布特是要让他到联合国去控诉越南。喝茶时，他对西哈努克说：“殿下在世界上有

很多好朋友，一定能够为柬埔寨的利益争到好处。”西哈努克应对说：“我感谢阁下的政府派我去当一名‘律师’。”然而，面临灭顶之灾，波尔布特还吹牛：“这次战争不会拖太久，也许只须两三个月，我们的战士和人民将把这些越南人打败。将侵略者赶出柬埔寨国土。到时，殿下愿意回国，我们将在祖国恭候。”在回忆这段话时，西哈努克不无幽默地说，他很钦佩波尔布特的口才和临危不惧的镇定。

最后，波尔布特说：“形势非常紧急，我们必须撤退。现在是需要您帮助我们的时候了，因为您在联合国很有名望。您愿意帮助我们吗？”西哈努克在说一些义不容辞的答应话时，英萨利插话：“我们安排了飞机，但由于座位不够，您只能同夫人先走。”西哈努克担心亲属将成人质，向波尔布特请求说：“请允许让我的全部家庭成员和我的同事，同我一起走。”波尔布特看了看英萨利，然后说：“好，让他们全体上飞机。”还是波尔布特决定放人，英萨利好像比波尔布特更刻薄。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傍晚，西哈努克再回到北京，他已经再也见不到周恩来了，是起死回生的邓小平亲自来接的机，西哈努克走下飞机时，邓小平快步迎上去，第一句话又是“欢迎您再一次来到第二故乡”，不知道这话有没有歉意。几天后，西哈努克就从北京启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从他离开金边之时起，柬共派了秀木、杰春等三人全程监视西哈努克。

在安理会柬埔寨问题特别会议上，西哈努克谴责越南侵略，古巴追随苏联帮越南说话，安理会谴责案的表决票数大大不利于越南，但苏联动用了否决权。西哈努克完成了他对柬共的承诺，却心如死灰，他声明以后他是“自由人”、“爱国者”，不再代表任何政府了。他机警地递纸条给美国保安人员，要求美国给予政治庇护。他和莫尼克，终于甩脱了柬共人员的尾随。

西哈努克向他的仇敌美国申请庇护，本可以成为一条惊人的消息，但美国考虑到要与中国结盟对抗苏联，就必须给中国人面子，因此先安排他们夫妇住进一家医院，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不久，邓小平应卡特总统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二月一日他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见面。

饱受毛共摧残后复出的邓小平，抚慰饱受柬共折磨的西哈努克说：“红色高棉对殿下种种做法是令人遗憾的，他们忘记了殿下对柬埔寨革命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尊重殿下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甚至还不满中国，对此我也应该向殿下表示道歉。”邓小平还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在中国将有绝对的自由，而且不再提出要他和柬共合作的要求。但邓小平对几百万柬埔寨人民，和数十万柬埔寨华侨，却没有说过一句抱歉的话。

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要面子的国家，而西哈努克就是中国的面子，惟有在中国他才能予取予求，这些斤两他都掂量得很清楚。于是，西哈努克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决定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必须接受某一国政府的供养，最好就是中国政府。”二月十三日，西哈努克从纽约飞回了北京，中国政府给了他国家元首规格的欢迎。

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

毛泽东“输出革命”是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而五、六十年代中共操办“输出革命”的就是邓小平，当时中共和越共的立场是一致的，要推动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据马来亚共产党领袖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说，一九五九年马共就作出了停止武装斗争的决定，而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会见马共领袖，促令他们恢复武装斗争，并在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以秘密管道向马共持续提供了巨额的运转经费。

但是，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后，他的“输出革命”的立场，发生了南辕北辙的变化，而正是柬共的困境促成这种变化。因为援助柬共的物资必须通过泰国，一九七九年中共要求设在中国境内的泰共“爱国阵线之声”降低调门，泰共拒绝这个要求，电台随即被关闭。一

九八〇年十二月，邓小平接见陈平，要马共关闭设在湖南山区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理由是要换取东盟国家在联合国支持柬共，而且是“李光耀要我立刻终止广播”。

事实上，东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都是在中共的直接参与和帮助下展开的。参加缅共斗争十五年的杨美红女士，在她的《婴粟花红》一书中披露，缅共许多干部都是在中国受训武装斗争的，而缅共人民军的“七号”、“八号”首长就是中共的军事顾问，其基层有大量的中国知识青年参战，缅共的军需和装备，更是由中共一手操办。她所描写的缅共的斗争方式和自相残杀，与我所见到的柬共所为完全雷同。

杨女士说缅共的中央会议常常是在中国境内召集，会议厅中悬挂毛泽东、林彪和缅共主席德钦丹东相片，会前三呼“毛主席万岁”和“德钦丹东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德钦丹东翻版中国文化大革命，党内也搞什么“斗私批修”“抓走资派”。中央书记处书记巴丁、中央分局书记顶吞、政治局常委博铁、依洛瓦底江军区政委梭东，都被无端处置，被杀前自己挖好葬坑，刽子手的屠刀提起，就人头落地。而德钦丹东也被贴身警卫一枪，结束了作恶多端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中共反省历史。邓小平认识到“输出革命”是在祸害世界人民，中共作出了停止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决定，从此东南亚各国走向国泰民安。